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elf-media on “Selective Reporting” Behavior

Xiaojun Su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Shandong, 278600, China

Abstract

Since 2014, the self-media has sprung up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rain, it seems to stand in a safe zone outside the control range of the official media, impacts and even threatens the “selective reporting” behavior of the state media all the time. The self-media fills the information gaps reserved under the “selective reporting” behavior, breaks the imbalance of the information ownership, and even sends the official media into the “Tacitus Trap”. The self-media has responded to the “information edge ball” produced by the official media, restore the reporting scene in an all-round way, and the right of value judgment and choice can be returned to the public.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be vigilant that the full support of the self-media for the re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often destroys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selective reporting”, resulting in rumors, public emotional panic and even social disorder. Whether the “selective reporting” behavior can continue to be adopted, if so, how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media and “selective reporting” behavior is also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Keywords

self-media; “selective reporting” behavior; trust crisis

浅析自媒体对“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冲击

孙小钧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山东日照 278600

摘要

从2014年起,自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它似乎站在官方媒体可控范围之外的安全地带,无时无刻不冲击甚至威胁着官媒的“选择性报道”行为。自媒体填补“选择性报道”行为下预留的信息空白,打破信息拥有量的不平衡,甚至将官媒送入“塔西佗陷阱”。自媒体接招应对官媒打出的“信息擦边球”,全方位还原报道现场,价值判断与选择的权利也因此可被交还于公众。但需警惕的是,自媒体全力支持真实舆论环境,往往破坏“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初始建构,造成谣言四起、公众情绪恐慌甚至社会秩序混乱等。“选择性报道”行为是否可以继续被采用,如若可以,那么如何平衡二者关系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自媒体; “选择性报道”行为; 信任危机

1 引言

自2003年自媒体概念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联合提出,到2014年自媒体酝酿成熟,开始在传统媒体的天下崭露头角。另一边,“选择性报道”行为常被官方媒体用以稳住公众情绪和舆论局势,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新闻客观性原则要求透过表层看到内里,在繁杂的信息中剔除遮蔽事实的隐患,不代表任何一方的立场去削弱事实的分量。^[1]不可否认,“选择性报道”行为在刻意违背新闻客观性原则,从一开始和根本上就选择好了报道内容的意识形态,隐藏某些事实不公开,不可避免地干预和妨碍了公众视听权限。

目前看来,迅猛发展的自媒体从2014年自媒体元年至今,

展开了与官媒“选择性报道”行为在“信息量与信息倾向性”方面的博弈,利用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一度使官方媒体陷入“塔西佗陷阱”。由此,我们有必要深刻剖析自媒体是如何冲击着“选择性报道”行为,即“胳膊是如何拧得过大腿的”?

2 自媒体产生前后“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处境变化

2014年被称为“自媒体元年”,这意味着在新闻发展历程中的浩荡数百年间,官媒的“选择性报道”行为大部分时间并无自媒体(近年来成长迅速的年轻媒体形态)干预,让我们来看一下自媒体产生前后“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处境变化:

2.1 自媒体产生前“选择性报道”行为强有力地严控信息输出

如若以2014年为界，2014年之前的“选择性报道”行为可以说是官媒的有力武器，例如灾难性新闻报道中“适当信息”被筛选出来公之于众，其中过程必然存在刻意隐瞒的现象。因为官媒与公众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信息单向传播模式，“喂养式新闻”“灌输式新闻”等被动新闻接受形态使得“选择性报道”行为的使用愈加“得心应手”。官媒意识到，信息出口是舆论引导的关键所在，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舆论场的大佬。但这种“选择性报道”行为（在没有自媒体平衡的情况下）所制造出的信息垄断，是当时的现实状况。

2003年是中国的重大疫情（“非典”）年，根据华中师范大学2017年发布的《善意的谎言：从“非典”时期中国媒体隐瞒疫情来看》一文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官方媒体对的疫情从隐瞒到正式、正面地公布‘非典’疫情，是十分漫长的过程。”^[1]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得知，官媒背后的强大支撑是试图维持社会稳定的政府部门，但这种信息逐步放出的情况也基本只存在于自媒体产生之前，自媒体产生之后就没能这么容易控制了。^[2]

2.2 自媒体产生之后“选择性报道”行为的步履维艰

官媒信息垄断的状态直至2014年被打破，自媒体将单向传播变双向互动，信息输出口由单一变无数，因此官媒“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实施处境也略显艰难，且自媒体越发展，其处境就越艰难。一方面自媒体使公众获得知情权及自主发言权，使得官方媒体“选择性报道”行为的使用并不会十分顺利，自然地，自媒体开始与官方媒体站在同一信息平台，官方媒体因而有了潜在的监督对象。“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处境也每日艰巨。

3 自媒体的出现对“选择性报道”的冲击

（1）自媒体与“选择性报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更多地，自媒体往往破坏“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初始建构及其“议程设置功能”。

自2014年自媒体（“We media”这一理念源于硅谷最著名的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元年起，电视机前定时收看消息的观众摇身变成“最接近新闻的人”，“人人都可以是新闻发布者”“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的八成信息都由自媒体首先

开掘和公布”这些话近年来愈发现实可靠。自媒体时代的信息流通速度快到难以想象，信息量输出量成倍积累，与此同时，自媒体新闻是自主化、多元化的表达，打破了传统新闻一言堂的格局，实现了不同立场、不同价值取向的多种声音的汇集与表达。^[4]公民以目击者、亲历者的身份将新闻事件（原貌或变形后）进行传播，使得新闻“透风性”无限放大而“严密性”几近不见。

1989年11月25日，李瑞环再次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5]媒体编辑要对敏感信息进行慎重的筛选把关，力争做好议程设置工作。自媒体与“选择性报道”行为二者存在的矛盾在于，自媒体通常公告的是未经筛选和过滤的信息（极大可能不符合官方设定的舆论方向，信息内容包括伤亡惨重的数据、未经核实的目击者阐述的观点以及在真相空窗期信息传播经常出现的谣言等）。自媒体在一次次完善着公众对新闻事件的了解程度和角度，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公众情绪的波动（震惊、惶恐、愤怒、失望等一系列负面情绪），以至于官方媒体几乎无法通过“选择性报道（Selective reporting）”行为——新闻界“无形的手”引导舆论，稳定社会秩序及公众情绪或达成其他意图。换句话说，自媒体已不甘在既定的议题下马首是瞻。简略的消息已知足了他们对消息事实真相的发掘。

自媒体打破了官方媒体最初的舆论建构，在极具争议的新闻事件中，舆论环境还有可能出现极端偏转和舆论导向能力明显下降的现象。

自媒体和官方媒体“选择性报道”行为的这种矛盾的存在，具有一个前提限制：公众作为媒体发声的“弱势群体”主动与自媒体划为一方。因而后者往往更易受到冲击。正如美国学者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其《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一书中谈到的：每一种新的媒介都可以用来生产新的鬼魂^[6]。

（2）自媒体打破信息不平衡局面，无时无刻不削弱着官方媒体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和全依赖程度。

自媒体让“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实质表露，同时可以理解“选择性报道”行为本无可厚非：“信息不全，故意而为之。”新闻现场信息基本为官方部门调查结果以及现场目击者的询问结果，同时需要综合考虑信息真空期时长、社会秩序状况、舆论环境偏向等因素后，决定是否报道以及报道尺度。虽然官方媒体独立性渐强，但仍时常被政治环境左右。此为“选

择性报道”行为的初衷，意在稳定社会秩序，避免人群恐慌，降低负面事件影响，维护国家（政府）形象。但“选择性报道”因其真实但不全面的性质，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被当作遮盖事实真相、过度维护地方政绩的手段和工具。

而自媒体用户与官方媒体专业新闻人抛去专业性的差别之外，更多的是话语权限的设定范围：自媒体用户更多地是第一新闻现场的目击者甚至全过程亲历者，必定了解事发现场全部事实，随着自媒体数量的不断庞大，自媒体用户将会掌握更多的信息。与此同时，自媒体用户无需维护任何政治立场、社会秩序等，做着还原真相的非义务工作。在官方媒体“被动曝光”的过程中，官方媒体的“选择性报道”行为的本质逐渐被无法满足于极少信息量的公众看穿，自媒体渐渐获取公众的信任度和依赖程度。

自媒体发布信息具有不可测和不可控因素，官方媒体试图隐藏和遮盖的数据或信息极有可能被目击者和亲历者记录和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出来，此时自媒体和官方媒体平台信息量产生不均衡现象，多数情况为自媒体信息发布量和信息发布角度多样性超过官方媒体。该情况将可能导致的结果为：自媒体无时无刻不削弱着官方媒体在公众心中的信任度和全依赖程度，使官方媒体深深陷入“塔西坨陷阱”。

（3）自媒体将信息全方位真实地还原至公众面前，价值判断和事件倾向判断因此可被交还给公众。

自媒体提供自由公开的信息流通环境，这提供给公众质疑和反驳“媒体单方叙述信息”的机会和渠道，自媒体填补官方媒体预留的信息空白，公众因此获取更多角度信息，拥有更加细致的评判标准。信息的充足使公众果断抛开官方媒体此前的灌输式新闻，重新拾起得知全面信息的自由权利。借以评论的方式，公众得以用自我价值观判断孰是孰非，而非对官方媒体营造的舆论“言听计从”。

上文举例“非典”疫情，我们需从中反思，官方媒体在“非典”初中期通过“选择性报道”行为控制舆论，但疫情扩散不会停止。这使得“非典”疫情错过了最佳的控制时机，强烈的舆论管制，成为了非典事件急速恶化、转而走向暴动的巨大隐患。反观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事件，媒体24小时不间断播报疫情进展，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每天都在报告中国前一天各省感染人数及其他国家感染情况的新闻，将有关疫情的信息、数据提供给公众；^[3]为了

防止群众对猪类产品的恐慌，从4月30日起不再用“猪流感”来称呼，而是用更为准确的“甲型H1N1流感”。人们或许有所害怕但并不会因为现实情况的突然改变或因谣言的流传而感到惊慌，更多地使官方媒体的公信力将急剧下降。

如若此事件发生在自媒体时代，自媒体将主动凝聚声势，共同用事实的武器拷问官方媒体似乎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长久看来，公众“更加信任对象”将纷纷从官方媒体转移至自媒体平台。后续连锁反应（最消极的则是公众给予官方媒体的关注度和信任度降低）不再过多提及。

4 结语

协调自媒体与“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关系是稳妥及切实可行的。自媒体对“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冲击本质上是公众支持全真实舆论环境的强烈意愿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另对“选择性报道”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公众对信息的渴求度大幅提升的现在，在综合考虑社会稳定程度、信息量平衡与否、公众价值判断是否正常等因素后，我们需继续探讨该行为是否仍然可以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被采用，若可以被采用，如何衡量“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尺度问题。之后，我们针对协调二者的关系方面提出两个问题：（1）如何利用自媒体规避“选择性报道”行为带来的弊端。（2）如何在自媒体时代发挥“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功用。在研究自媒体对“选择性报道”行为的冲击之外，我们还可以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研究以上问题。

参考文献

- [1] 王永亮. 媒体的选择性报道贻害无穷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2(5):5.
- [2] 高素, 王凤娇, 朱璠马, 丹凤. 善意的谎言: 从“非典”时期中国媒体隐瞒疫情来看 [J].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媒介伦理案件库, 2017(06).
- [3] 朱颖, 刘祎. 从“非典”到“甲型H1N1流感”——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变迁 [J]. 东南传播, 2009(09):59-61.
- [4] 彭芳坪, 刘军, 陈涛. 自媒体时代对媒介即讯息的诠释 [J]. 软件导刊(教育技术), 2014, 13(06):79-81.
- [5] 李海南. 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D]. 河北大学, 2006.
- [6] 彼得斯.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 [M]. 何道宽,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